

白雲論壇

第二卷

张本义 主编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白云论坛

第二卷

张本义 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上 辑

李学勤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3
葛剑雄	在非洲看历史文化	20
葛剑雄	中国移民的过去与未来	38
王充闾	用破一生心	59
李兴盛	流人与吴兆騫	70
孙昌武	佛教与中国文学	83
王充闾	中国传统诗的创作与欣赏	97
木田知生	《杨家将》故事的演变	117
钱定平	从《围城》到《破围》	128
席泽宗	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	157
席泽宗	天文学与传统文化	169
钱定平	解读二十世纪文化的科学底蕴	179
丛文俊	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	211
丛文俊	当代书法的创作思潮	232
丘程光	书法在新加坡	252

下 辑

张本义	吟边素语	265
张本义	罗振玉在近代书法史上的地位	284
萧文立	简论罗雪堂笔记学术价值	292
李贵生	经学的扬弃: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	297
李洪岩	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	341
范旭仑	陈寅恪致桥川时雄书笺证稿	372
李元星	殷王奉祀虚农黄三大氏考	378
辛 欣	清朝关于海防建设的两次讨论	392
李成充	《老子》“三”为“气”考	403
张培锋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405
王 若	《韩湘子全传》探源	420
陈渊斐	《混唐后传》成书晚于《隋唐演义》论	428
戴立强	明钞本《书画萃苑》考	431
薛 莲	《清真释疑》版本考	441
陈艳军	《优语录》与《优语集》之比勘	445
王 宇	孙惠珍 敦煌本《肇论》校记	465
于 丹	汤印华 《文徵明集》校补	470
萧文立	十载春风忆鳃翁	479
张本义	哲人千古传圭璋	484
张本义	悼于师植元先生	490

上 辑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李学勤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非常荣幸到大连图书馆来,在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中与各位见面。大连图书馆的领导和白云书院工作人员,如此热心地提倡文化、普及科学,值得我们感谢。今天我谈一下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是向各位汇报一下我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过程、成果以及我国“十五”期间的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的一些情况。有不当的地方,希望在座各位能给予批评指正。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是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主要成果,第三是谈我们进一步探求中华文明起源的途径和相关的一些计划。

一、研究中华起源的重要意义

我想大家很习惯于这种说法: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句话已不是简单的习惯和口头禅了,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包括海外华侨华裔引以为豪的一句话。这句话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联系。为什么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前有炎帝、黄帝的传说,所以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回事。由此可见,探求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寻根过程,从这方面谈,我想每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它的意义。

*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二〇〇二年八月十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鲁岩整理,邱菊、陈渊斐校订。

那么我们是否能从更远一点,从整个人类以至于从整个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起源问题呢?各位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科学都可以算作历史的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整个自然界、宇宙起源、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以叫做自然史,有了人类就有人类史,我们所有关于人文科学的,包括文史各方面的研究,都称为人类史。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这样看整个宇宙的发展直至人类的发展,可以在整个过程中找到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就是“起源的问题”。

第一个起源问题当然是宇宙的起源。过去的人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宇宙也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宇宙没有起源。这种说法从现代理论物理学上看是不正确的,现代理论物理学认为整个宇宙是有起源的,宇宙的时间是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至今有多久,有各种意见,其中流行的看法是大约一百五十亿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不管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对于宇宙的起源探讨还是天文学界、物理学界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

从宇宙的起源问题再推进就是银河系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直至推向距我们更接近的地球的起源。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人类目前能直接接触到的世界,地球这个世界究竟有无起源?何时起源?

在地球起源之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起源问题,就是生命的起源。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证明地球之外存在生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探索宇宙间的生命问题。

之后是人类起源问题,人类是如何从动物界、生物界脱颖而出形成这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在中国发现过很多古人类化石,如周口店的北京人,后来又发现了比北京人更早的云南元谋人。近些年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又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现在的所有人类都不是我们发掘到的人类化石的后裔,而是在三五万年前非洲一位老太的后裔,这就是所谓的“夏娃理论”。但中国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并不赞成这种理论,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那么,人类从何时进入文明,是怎么起源的,在什么条件下起源?

还有,世界上曾出现过多种文明,起源的早晚不同,有的是独立发展,有的是在其它文明影响之下发展的,中国的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呢?这就有了具体的目标了,这个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自十七世纪起就有一些学者讨论文明起源的问题。经过文艺复兴后,欧洲的学者对于全世界的人类情况、历史情况、文化情况逐渐有所认识,做了很多研究,很多调查。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晚期也曾研究过文明的起源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学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它研究人类社会中阶级、国家等等一系列问题是如何起源的,不了解这些起源问题,怎么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所以他们要研究这个问题。为此,马克思看了相当多的科学研究著作,特别是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俄国重要学者科娃列夫斯基的有关著作,当然还有英国学者梅茵等人关于古代法和古代共同的研究。马克思写了很多笔记,这些笔记和观点得以保存,收入在《马克思全集》中,但马克思本人没有来得及就这个问题写成专著。马克思逝世后,他的遗愿由恩格斯实现了,恩格斯在晚年写了一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述了人类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问题。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这本书,现在外国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讲文明起源问题时,还常常拿它来参考。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接触到中国的事情,所以这些书中没有讨论到中国。这是因为历史条件所限,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中国第一位著书来讨论中华文明的是郭沫若先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先生流亡到日本,他在一九二九年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序言中明确谈到:他要补充恩格斯所没有接触到的中国这一空白,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问题。这部书于一九三〇年正式出版。

刚才我所谈的这些多是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文明起源问题,可是正如讲座开始时我谈到的,对中国人来说,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其特别的一面。中国人一直以悠久历史而自豪,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表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海外华侨华裔经常提到这个

问题。这里我举一个亲历的例子：七十年代末，我们几个中国学者组成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因为中国学者出国访问是非常罕见的事，所以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特别是华人华裔学者的热烈欢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讲学，悉尼大学是澳洲独立以前建立的，是澳洲最古老的大学。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走过来，他用英文进行自我介绍，说姓马，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已是第四代了，最惭愧的是作为中国人的后代却不能用中文交谈和看书，这是自己的耻辱。他很了解中国文化，看到我们来了非常高兴，要把他写的书都送给我们，带到北京去，他以后要到北京访问。我们听后觉得很高兴，这位马先生是东南亚最著名的会计学专家，他给我们的著作有一米多高，我们只好请大使馆海运寄回去。其实外国人也这样，我再讲一个故事，从澳大利亚回来不久，我们又到美国访问，和一个犹太社团聚会，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问我：“你们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你们谈的事情都那么久，你们中国人看美国人是不是都是BABY呢？”意思是说中国历史悠久，而美国只有二百年的历史，中国看美国会不会觉得很小说呢？我非常客气地说美国虽然只有二百年历史，但文化很深远，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她听了很高兴。可见我们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也令外国人钦佩。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我刚才提到许多学者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多种研究。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更有条件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从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际上曾有一次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欧美有很多学者重新探讨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问题，在国际上有对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探讨的背景和要求。另一方面，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考古工作大大发展起来，有许多新发现，有些是震惊世界的发现，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在研究材料上做好了准备，使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契机。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便可以开始了。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及主要成果

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过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座各位也许听说过这个工程,为什么要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呢?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但究竟有多少年?说我们的文献记载有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那么他们究竟在哪个年代?这要有一个明确的尺度。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一个量化的过程,对于古代的历史,我们也要给一个科学的尺度,这就是年代学问题。所以我们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交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记载的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但研究起源问题的项目为什么立在夏商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起源于何时,这本身就有一个时变量变的问题,要确定它我们需要一个起步点,这个起步点不是一下就追溯到五千、六千、七千年以前,不能这样,要一步步、逐步地去做,所以我们首先从中华文明发展比较昌盛的夏商周三个时代开始,而且是从后向前推。我们首先提出夏商周年代上的问题,因此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现在我把这个工程建立的过程向大家介绍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一位自然科学家提出的,这一点值得研究文科的专家学者深思。这位自然科学家就是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宋健同志是研究控制论、系统论的,又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宋健同志经常到国外访问,包括著名的文明古国,比如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等,与这些国家的大学、博物馆都有过交流,看过很多研究成果。他说过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很深刻的感受。外国对于古代的历史时期研究得很透,如埃及的年代学是很清楚的,古埃及分为前王国时期、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中间还有两个中间期,然后是希腊化时期。埃及的各个时期、各个王朝之间的关系和年代都是很清楚的,它的年代是得到国际上公认的,它对古代文明的研究有一个明确的尺度。古代希腊也是如此。可是再看中国,中国的历史书、博物馆,这些问题不清楚,说法不一致,而且没

有国际公认的年表。宋健同志认为这对进一步探究中华文明起源会造成困难,在此情况下,他提到是否可利用我国近年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支持文科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来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他在一九九五年的九月份找了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了在座学者的支持和同意。宋健同志又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名称,因为他是个自然科学家,所以就提出这样的名字,大家也都接受了。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九五年年底,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会议还有另一位国务委员主持,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因为在一九九六年前后,国务院的分工是宋健同志主管自然科学技术,李铁映同志主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博物考古工作,所以由他们俩人主持,就等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了。会议又邀请了七个部委领导参加,包括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另外还有在京的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会。会上正式提出要在“九五”规划中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由七个部委的领导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工作是“政府支持,专家负责”。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点,会上聘请了四位首席科学家,代表了四大学科门类: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量技术。以这四位首席科学家为中心,一九九六年上半年成立了由二十一位不同学科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四位首席专家担任专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这二十一位专家起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报告说明进行这个项目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报告一九九六年五月上旬在科技部通过。大约在五月十六日,国务院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还是由李铁映、宋健两位国务委员主持,由领导小组召集,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时间是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

这个工程我们完全按照系统工程的方法来设计,约涉及十个学科,建立了九个课题,下设三十六个专题,到工程结束时增加为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工作的科学家达二百多人,涉及到的地方主要是四省一市,即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首先是对刚才讲到的

九个课题三十六个专题一一进行论证,论证时要选定每个课题、专题的负责人,由其组织人员起草具体的论证,包括课题的主题、对主题的认识、达到目标的途径。评审论证由工程以外的专家组负责,论证不通过,就得不到资金和人力。这个过程很长,但必须这样做,因为论证的过程也就是组织工作的过程。自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在北大现代物理中心召开第一个论证会开始,真正完成所有的课题论证工作,是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真正的全面铺开是九六年的第四季度。这个项目抓得很紧,经常是半年一汇报,一年一总结,按照“九五”规划的进度,我们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底,各个课题、专题都基本拿出了报告,也有个别的专题没完成,但都能清楚说明情况。一九九九年年底,经过两院院士投票,“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列入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二〇〇〇年九月,我们正式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正式结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们阶段性的成果报告,“夏商周年表”也正式发布。这是二百个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整个工程完成过程基本是这样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结果集中起来体现在一张年表上——“夏商周年表”。表很小,用小号字排,只有一张报纸大小,可结果却非常重要。这次研究产生的成果大约有三十本书,包括整个工程的各种研究报告、考古发掘报告、实验室报告和各种论文、资料。我们准备陆续出版,这里必然会存在一些误差,请大家批评讨论。今天在这里不能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全读出来,就谈一下研究的途径。

首先我要声明“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就是一张年表。有人会说,中国过去就有年表,古书中有,后来也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墙上就挂着一张年表,为什么还要制新的年表呢?这是因为那些年表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制成的,这只是研究的条件,而不是结果,是没有具体根据的,我们得出的年表看起来与过去的年表差别不大,但是新的年表提出的每一个数据都有一个科学的根据。不是说我们做得一定是对的,但我们总有一个理由,我们在不定期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科学论证,得出数据。

我们都采取哪些方法呢？我给大家说明一下，中国历史上确切的年代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八四一年，这涉及到什么是确切上推。我们有正史，二十四史，第一部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就有年表，第一张年表是“十二诸侯年表”，它不是从春秋开始的，而是从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开始的。大家知道西周晚期有个周厉王，是个无道昏君，国民起来把他赶下王位，由周公、召公两位大臣执政。周、召两位是共同执政，所以就是共和，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八四一年。我们可以推到共和元年，为何不再往上推了呢？为什么《史记》不再说之前的事了呢？其实司马迁不是没看到过更早的年表，而是看到过很多种年表，从黄帝以来都有年数，可是他看到的这些年表多有不同，互相矛盾。司马迁是个很谨慎的人，他看到这些互相矛盾的年表，无法判断其正误，只能是置而不论了，因此我们只上推到八四一年。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也是常有之事，古埃及的年表只到公元前两千七百年，古希腊也是。古代的历史没有一个确切的年数怎么行？就有很多的学者想弄清楚。

在司马迁之后，西汉晚期有一名叫刘歆的学者，一位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大家可能知道前些年美国曾发射过一颗人造卫星，拍到了月亮背面的地图，发现月球背面有一环形山，就用刘歆的名字命名它，可见刘歆的影响力。刘歆就用他所看到的材料做了推算和研究，他研究的结果保存在《汉书》中。按照他的推算，如果武王伐纣这一年就是周朝的开始，那么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他的结论是关于武王伐纣的各种年数中最有影响力的，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采用。

刘歆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学者做过努力，做过研究，但他们的结果都不能得到公认，就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只能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没有别的材料，他们所采用的材料大多也不超过司马迁所能看到的范围，而且原始的材料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他们改变不了司马迁那个时期的结论，他们的研究也不能得到公认。这种情况从西汉晚期一直到清代中叶没有改变，中国年代学第一阶段的研究程度基本如此。

到了晚清，由于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情况就有所改变。今天上午我就到旅顺博物馆看了青铜器陈列，其中有很宝贵的材料，旅顺博物馆

的收藏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有机会都应去看一下。这些青铜器上面刻有铭文,记载有当时的时间、历日,根据历日,晚清的许多学者做了推算和研究,这种情况就超出了纯粹书本文献记载的范围。特别是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了甲骨文之后,收集到商代的很多材料,因此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成果,有了很大进步。

但还有一个局限性,过去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就是年代学问题已不是单学科的问题了。许多学者单兵作战,不与其它学科的研究者沟通,研究就有一定的缺陷。这些情况只有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这种研究形式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提供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大规模地组织起多学科的研究项目,弥补这项缺陷。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会看出我们是怎样做这个研究的。假设我们有两条生产线,生产古代的年代数字——因为我们想要的结果是年表,年表是需要数字来表现的。一条生产线的原料是文字材料,如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的材料、甲骨文的材料等;另一条生产线的原料是无文字的物品,例如出土文物、考古遗址等。文字生产线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古书中有关年代、天文历象的材料通通缩微起来,编在电脑中建一个资料库,考虑到中国古书汗牛充栋,我们对唐代以前的书普遍性搜集,唐代以后的书籍重点搜集。这些资料都要进行文献学的估量,鉴定一下可信程度、利用价值,将可信的资料提取出来进行计算,在这方面图书馆做了大量工作。计算是交给天文历法学家进行的,用天文学软件来计算。使用的天文学软件主要有三种,有两种是从美国宇航局引用的,另一种是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制造的天体历行软件。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行推算,得出天象和历日,很多天象还可以利用软件显示出来,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数字。无文字原料的生产线,首先要选择与夏商周有关的重要遗址,最主要是一些都城遗址,夏商周的都城大都分布在四省一市的范围内。在以前考古工作基础上进行试掘、补充发掘,并把材料做成系统的标本、各个地层的标本,在改造过的三个 C14 测量实验室,用放射性 C14 的方法对这些标本进行测量。我们使用的方法,一种是常规方法,一种是加速器的方法。之后将其转化为历史年代,产生一些数字。这些都是多学科的研究,包含了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考

古学、核物理、核化学,甚至数学等等,各学科联系在一起,由学科专家来研究,产生了许多数据,再把各专题的结果综合起来,加以提高,编成年表。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后,不是任何个人的成果,而是二百个专家在二十世纪末所能做到的较好的成果。

我们有很多关键性的突破,现在我说第二个例子。我曾在报纸上提出“天再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年表中起了支点的作用。这个问题是古书中记载的,在晋武帝初年,现在河南省的汲县,有一百姓出去打柴,行路时脚陷到了地下,就发现了一个古墓,这个墓后来叫“汲冢”。根据当时的记载,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竹简,拉了许多车,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史书,叫《竹书纪年》。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周懿王是西周中期的一个王,“天再旦”的“旦”是天亮的意思。说的是周懿王常常不住在首都中州,而是住在郑,郑这个地方在陕西的华县,有一天出了一件事,郑这个地方天亮了两次,大家都很奇怪,所以史官就记录下来。长期以来这件事都被认为是妖翳,后来稍微懂一些科学,又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四十年代,我国天文学家刘朝阳认为这件事应该是真事,有天亮发生日全食的现象。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天亮,太阳没出之前天先亮,在天文学上称之为“蒙气差”。因为地球上有大气层,光线已被折射出来,天就亮了,然后太阳才出来。当日全食出现时,太阳要被遮去超过百分之八十八,天会黑下来。“天再旦”应该是日全食在太阳还处于地平线下面的时候开始的,日全食有个过程,刚开始不太影响太阳光,所以天还是亮的,然后太阳从地平线升起,这时日全食也逐渐增大了,等太阳完全上来了,日全食也到了时限,把太阳遮住了,天又黑下来,然后太阳再上升,日食结束了,天又亮了,相当于天亮了两次。刘朝阳提出的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可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没有计算出这是发生在哪一年,只是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六十年代有位韩国学者叫方善柱,计算出这种情况在陕西华县确实发生过,有两个年数,一是公元前九二五年,一是公元前八九九年。后来美国的两位华裔学者,一位是在美国宇航局工作的物理学家彭杰君,另一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周鸿翔,两位学者合作,用宇航局的计算机软件进行测算,认为公元前八九九年更确切。这个现象虽然可以在天文学上计算

得很精确,但还需要证明。机会恰好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生了,一九九七年三月初,可能是三月七日,恰好发生了二十世纪我们国内能够看到的最后一次日全食。这一天国内外的科学家都到中国的东北来做观测,因为日全食最佳的观测地点是在漠河,中央电视台也做转播。漠河虽然是看日全食最好的地点,但是在十点钟左右发生,而不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通过计算决定找一个最佳观测地,是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我们和那里的天文台联络过,但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用意,没有同意。我们只好派了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到新疆西北的边境布置了二十多个观测点,组织当地的群众观察、感受这件事。那天,亲自感受到了“天再旦”的现象,这个现象跟我们想的有所不同,据当地群众和我们派去的专家后来形容,“天再旦”是很可怕的事。天刚开始亮是正常的,可天再黑下去的时候,与正常的天黑不同,变成了黑红的颜色,很恐怖,然后天又亮起来。这个观测确切证明了这个事件,而且我们再用天文软件计算,排除了九二五这个数字,惟一可能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八九九年,这个时间就成为年表的重要支点。像这样的支点,西周时期我们就有七个,这里不能一一介绍,只向大家说明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证明中国古代一些问题。

三、进一步探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其阶段性报告的简本已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正式发行,年表在新版的《辞海》、《新华字典》等各种辞书和教科书中陆续采用。这些成果不是最后的结果,科学总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做的只是我们这些人在二十世纪末通过努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其中必然有许多要修改和补充的地方,这个工作还需要以后逐步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规模,更系统、更深入地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因此我们已经在“十五”规划的开端,准备用三年时间为新的一项中华古代文明起源项目做前期研究。因为再开展的项目要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学科更多、范围更广,所以我们要用三年时间做前期研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中做准备工作,然后定一个大型